

是否存在 侨汇陷阱？

高侨汇水平可能会引发经济停滞及依赖的恶性循环

拉尔夫·沙米、埃克哈德·恩斯特、康奈尔·弗伦坎普、安妮·欧金

由于可能改善数百万人的生活，工作者向其国内家庭汇入的资金，也就是侨汇，引起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2017年，侨汇金额超过4000亿美元，从规模来看，侨汇的排名介于官方发展援助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如此庞大的资金流对于接收这些资金的经济体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当许多国家所接收的资金流入比该国的出口规模甚至经济规模都要大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侨汇有助于经济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侨汇是由家庭关系驱动的点与点之间的资金转移，这些来自国外的钱将有助于家中亲属支付其生活所需。其次，侨汇也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通过人力资本或物质资本的形式注入投资或者进行新业务融资。

经济学家们一直致力于测量这两种效应。很多研究证实，侨汇对于对抗贫困而言至关重要，使数百万家庭从贫困或无力生存中摆脱出来。但与此同时，经济研究未能发现侨汇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见图1）。

后者的结果令人费解，特别是在已发现侨汇收入可以促进更多家庭消费的情况下。消费支出是短期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当为了满足新增需求而进行产业扩张时，最终也将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但越来越多的对侨汇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侨汇会以减少增长和增加对国外资金依赖的方式改变经济。换句话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侨汇陷阱导致经济陷入更低增长、更多人移民的循环之中。

引擎、减震器还是制动器？

以黎巴嫩为例。多年来，无论是从绝对数还是从相对数来看，这个国家一直是侨汇的主要接收国之一。在过去十年中，每年平均流入超过 60 亿美元资金，相当于 GDP 的 16%。根据 IMF 的数据，2016 年黎巴嫩人均收到 1500 美元，超过其他任何国家。

考虑到这些资金流入的规模，侨汇在黎巴嫩经济中起着关键（即便不是主导）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侨汇成为该国社会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均占家庭收入的 40% 以上。毫无疑问，对于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内战、入侵和难民危机的国家来说，侨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稳定作用。此外，侨汇也是外汇的一个宝贵来源，比该国商品出口多出 50%。这帮助黎巴嫩在政府债务高企的情况下也能维持汇率稳定。

虽然侨汇有助于黎巴嫩经济吸收冲击，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已经成为增长引擎。1995 至 2015 年间，黎巴嫩的实际人均 GDP 年均增长仅为 0.32%。即使在 2005—2015 年期间，它的年均增长率也仅为 0.79%。

黎巴嫩不是一个例。在侨汇流入与 GDP 之比最大的 10 个国家中——如洪都拉斯、牙买加、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尼泊尔和汤加——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增长率高于区域内的其他国家。而且大多数这些国家的增长率远低于其他国家。认识到这些国家每一个都面临着其他可能会影响增长的问题固然重要。但是，侨汇似乎是增长缓慢的另一项决定因素，而非其结果。侨汇甚至可能会放大制约增长与发展的其他一些问题。

寒蝉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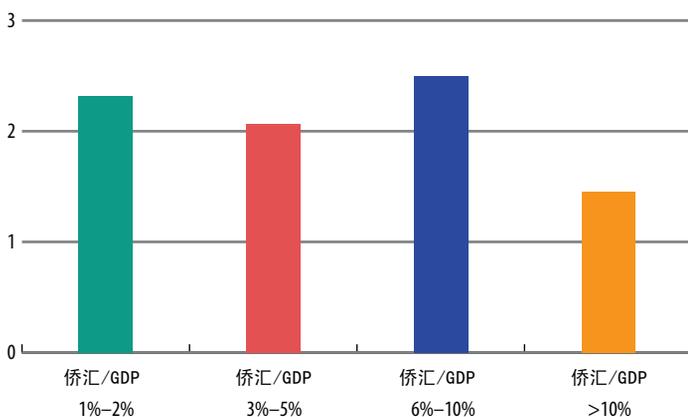
回到黎巴嫩的例子，该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可能被寄予厚望，以期能带来强劲的增长。黎

图1

无明显联系

没有证据表明侨汇会显著增加一国的经济增长。

(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百分比,按接收侨汇的水平划分)



资料来源: IMF,《国际收支统计》; IMF,《世界经济展望》; 以及作者的计算。
注:本图显示了1990—2017年间接收各种侨汇的国家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

巴嫩的家庭，包括那些接收侨汇的家庭，将大部分收入用于年轻人的教育，他们在标准化数学测验中的得分远高于该地区的同龄人。同时，中东地区排名前 20 位的大学中三所大学位于黎巴嫩，这些大学的研究人员形成的研究成果比区域内其他国家的更多。黎巴嫩充裕的侨汇流入可以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所建立的创业公司提供种子资金。

但统计数据显示，黎巴嫩的创业活动远远少于其应有的数量，特别是在高新科技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该行业的规模不到 GDP 的 1%，而且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黎巴嫩在该行业的发展得分非常低。针对在黎巴嫩接收侨汇的家庭的总体消费习惯的研究表明，不到 2% 的汇款流入用于创业。相反，这些流入资金通常被用于诸如餐馆用餐等非贸易商品和服务，以及进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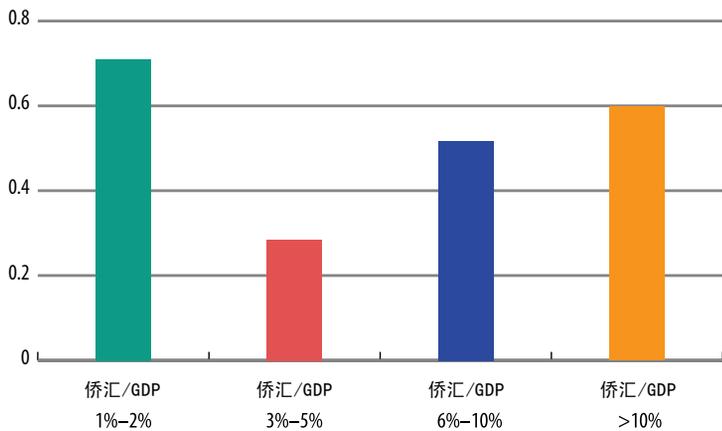
许多年轻的黎巴嫩人选择移民，而非创业——或是在已有的企业工作。统计数据非常明显：多达 2/3 的男性和近一半的女性大学毕业生离开国家。雇主抱怨移民出境人才流失导致缺乏

图2

患上荷兰病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侨汇导致汇率升值，使该国的出口竞争力下降。

(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百分比，按接收侨汇的水平划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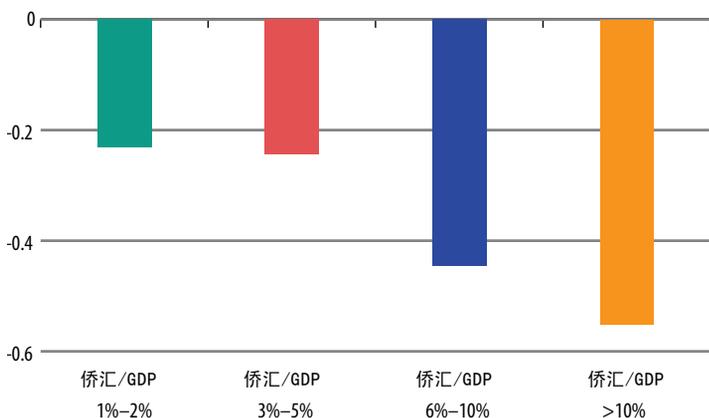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MF,《国际收支统计》；IMF,《国际金融统计》；以及作者的计算。
注：本图显示了1990—2017年间接收各种侨汇的国家的实际有效汇率。

图3

对政府效率的影响

经济体对于侨汇的依赖已被证明会降低政府对其公民需求的反应度。

(范围在-2.5(差)和2.5(好)之间, 2000—2016年平均值, 按接收侨汇的水平划分)



资料来源：IMF,《国际收支统计》；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以及作者的计算。

高技能工人。这种短缺被认为是除旅游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等传统的增长来源以外，黎巴嫩实现经济多样化的主要障碍之一。对于那些选择在其他地方谋求出路的年轻人而言，他们认为国内

缺乏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

因此，侨汇陷阱的出现似乎部分是因为这一收入来源为年轻人做好移民准备，而不是投资于本国企业。换句话说，接收汇款的国家可能会依赖出口劳工，而不是依靠此劳动力所生产的商品。在一些国家，政府甚至鼓励发展机构专门为出口生产熟练的劳动力。

但为什么这种情况得以发展且持续下去呢？

从家庭层面和经济层面研究侨汇对其接收人的影响，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解答。我们已经对收到大量侨汇的个别国家——如埃及、墨西哥和巴基斯坦——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且对接收各种汇款的各个国家（和那些汇出而非接收侨汇的国家）进行了国别比较分析。来自学术文献中的见解可以合并为一个一致的解释，说明如何以及为什么收到大量侨汇流入的经济体可能会陷入低增长。

首先，侨汇主要用于家庭消费，并且经济中对于所有产品（非贸易产品和贸易产品）的需求也随侨汇的增长而增加。这给价格带来了上行压力。外汇的大量涌入，加上价格上涨，使得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下降，导致产量下降。有些人把这种综合征称为荷兰病（见图2）。

恶性循环

侨汇对工作激励的影响使这个问题变得更糟，因为它增加了所谓的保留工资，即工人愿意接受某种特定工作的最低工资。随着侨汇的增加，工人从劳动力大军中退出，而由此产生的工资上涨给物价带来了更大的上行压力，进一步降低了出口的竞争力。

然后，资源从生产遭遇国际竞争的贸易品行业流向服务于国内市场的行业。其结果是：高薪、高技能工作岗位数量下降，这在贸易行业很常见；非贸易行业中低技能、低薪工作岗位增加。

劳动力市场的这种转变鼓励高技能工人移民出境，寻找薪水更高的工作。与此同时，大多数

家庭的生活成本随国内物价的上升而上涨，而竞争力的下降意味着更多的产品必须依赖进口，从而损害经济增长。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家庭成员移民的动力，这样他们就可以将钱汇回国内，帮助亲人承担更高的生活费用负担。

更糟糕的是，侨汇往往用于支付房产，从而导致房价上涨，并在某些情况下引发房地产泡沫。这也为希望赚取足额购买房屋的资金的年轻人提供了移民的动机。这一切的结果是：移民、经济停滞、生活成本上升，以及更多移民的恶性循环。

缺乏改变的动机

政府有可能通过采取措施，保持本国产业竞争力，以减缓或者打破这种循环。但是，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如改善教育体系和基础设施，价格昂贵且需要数年才能实施。此外，还需要强大的政治意愿，才能取得成功。

然而，研究表明，侨汇具有严重的政治经济副作用（见图3）。特别是，大量资金流入使政府对社会需求的反应度降低。理由很简单：接受侨汇的家庭可以更好地避免经济冲击，并且要求其政府改变的意愿更低；反过来，政府也觉得没有义务对其公民负责。

许多政治家欢迎因侨汇流入而减少的公众监督和压力。但政治家还有其他理由鼓励侨汇流入。从政府对消费征税方面来说，如增值税，侨汇扩大了税基。这使得政府能够继续在获得民众支持的事项上进行支出，从而帮助政治家赢得连任。

考虑到这些好处，许多政府积极鼓励其公民移民并汇款回家，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设立官方办公室或机构来促进移民，便则不足为奇了。侨汇让政治家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通过改善个别家庭的经济状况，使他们不太可能向政府进行投诉或审查其活动。对于移民和侨汇的官方鼓励也使得侨汇陷阱更加难以逃脱。

侨汇与经济增长率增加之间的关联缺乏明确

证据——缺失经历由侨汇带动增长的国家的例子——表明侨汇确实干扰了经济增长。此外，黎巴嫩的情况提供了侨汇陷阱是如何运作的具体例子。

如果侨汇陷阱确实存在，那么该怎么办？

显然，鉴于它们对数百万家庭福祉的重要性，侨汇不应该受到劝阻。难道侨汇陷阱只是社会为了降低贫困而必须换取的成本吗？未必。

鉴于对数百万家庭福祉的重要性，侨汇不应该受到劝阻。

防止侨汇的两个缺点——荷兰病和削弱治理——可以有助于各国避免或逃离侨汇陷阱。提升面临国外竞争的行业的竞争力是缓解荷兰病的一般处方。具体措施包括：升级国家的基础设施、改善教育系统和降低经营成本。政府还可以在刺激新业务形成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包括为初创企业提供种子基金或其他财政援助。与此同时，侨汇接收国也必须推动更强的制度和更好的治理。

提高经济竞争力以及加强治理和社会体制早已被认为对包容性增长议程是至关重要的。但侨汇陷阱为这些目标的实现带来了紧迫性。通过消除以前未被承认的包容性发展障碍来避免这种潜在严重的侨汇陷阱，可能实际上是释放其发展潜力的关键。FD

拉尔夫·恰米（RALPH CHAMI）是IMF能力发展学院副院长；埃克哈德·恩斯特（EKKEHARD ERNST）是国际劳工组织宏观经济政策及就业小组组长。康奈尔·富伦坎普（CONNEL FULLENKAMP）是杜克大学实践经济学教授。安妮·欧金（ANNE OEKING）是IMF亚太部经济学家。